

近代天皇制成立的前提

——试论孝明天皇

戎芬 卓凌译

前 言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而崩溃的近代天皇制，至今还是一个值得探索的历史问题。这是因为在锁国政策解除后的近半个世纪里，日本的资本主义实现了飞速发展，几乎达到了帝国主义的阶段。^①与此同时，它具备了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所没有的特色，即在政治、思想、土地制度等方面遗留下许多前近代的因素。而且近年来，日本近代天皇制又是亚洲唯一的发达资本主义体制。以上都是天皇制备受历史研究人员注目的原因。

日本作为一个特殊的近代国家，怎样看待其近代天皇制的世界地位，当然包含有批判的成分，仍然是当今的一个课题。

从制度的角度研究天皇制，在 20 世纪 30 年代日本资本主义论争时期曾经兴盛一时，但是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和镇压。直到二战战败，战前的天皇制崩溃才解除了这一限制和镇压。

尽管如此，对于近代天皇制的研究，仍然还存在许多问题，特别是战后的研究都有一个特点，即几乎都不涉及天皇本身。

^① 1868 年明治维新后，日本资本主义发展迅速，20 世纪初叶成为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国家。——译者

在战后的研究中，触及天皇本身的研究非常少，其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史料的问题；二是对天皇的政治地位的评价问题。

关于天皇本身的研究至今还有大批史料尚未公开这是一个很大的障碍。尤其是明治时期的主要文献几乎都未发表。可以说《明治天皇纪》全卷是一部由各类记录组合而成的“年代记”但是却没有“宸翰”或“手稿”之类来反映天皇自身的意志及行动的资料。只有一些就制度而言的“敕语”和“敕论”能够窥探天皇本人想法的资料只有“御制”和歌之类道德与精神的文献。另外由元勋、亲信等人口述或笔录流传下来的天皇逸事也都是些日常生活的琐事。甚至连各个时期臣子提交给天皇的“御元书类”都未曾公开过。这一切给当时政治中枢的某些方面蒙上了一层面纱。在史料方面仍然存在着天皇的“神圣感”。

有人认为，与明治天皇相比，拥有较多“宸翰”的孝明天皇，其末期的史料也大多被巧妙地隐藏了。

另一个影响天皇研究的原因是研究的出发点问题。

战前近代史的研究，除了一些反体制立场的研究之外，几乎都是从“王政复古”的立场来论述，过于强调了天皇的作用。德富苏峰的《近世日本国民史》就是其中的代表。

近代天皇制由于二战战败而崩溃，代之以“象征天皇制”。如前所述，此后关于幕府统治末期以后的研究很少提及天皇。^①我想这是因为战争中以天皇为中心的“皇国史观”、“王政复古史观”过于强调天皇的作用，为了纠正这一观点，才很少涉及天皇的研究。此外，也可以说是因为幕府统治末期以后，在历史上仍将天皇置于“象征的”位置，出现了一种所谓的“象征史观”的倾向。这种倾向不能充分地说明客观事实与作用。

田中惣五郎在《天皇的研究》中记载了幕府末期天皇的经济状况等，但基本没有涉及孝明天皇的行动。《天皇的历史》（福村出版）几乎都是关于古代、中世天皇的论稿，只有京口元吉的《明治天皇》一篇有所涉及。井上清的《天皇制》、根津雅史的《天皇家的历史》记载了幕府末期明天皇与尊攘派的矛盾，但并不是出自以近代天皇制为前提的立场。田中彰的《通往近代天皇制的道路》也是有关明治时期的著作。

明治以后时期 不公开史料 而是根据明治宪法将天皇制作为一种制度 把天皇自身的行动置于内阁、枢密院等国家机关、元老、军部这些实际上的推进母体当中。与此不同，幕府末期天皇的存在是在旧制度崩溃和新制度尚未成立这样一个特殊情况下的独特的存在。即使根据现在可见的史料，也有许多地方可以看出这个时期的天皇采取了相当积极的行动，他的行动不仅成为近代天皇制成立的前提，也成为了其成立的反面教材。

另外 值得注意的是 孝明天皇作为幕府末期的历史人物 其活跃时期很长。孝明天皇的活动时期从佩里来航日本到“大政奉还”的前夜 贯穿了整个狭义上的明治维新时期。而当时其他的历史人物在政治上只活跃了很短一段时间。

而且 通过现存的孝明天皇的“宸翰”可知 同时代的公卿自不用说 他比当时的任何藩主等历史人物都态度强硬 同时拥有将意见付诸实行的力量。

从以上几点来看，可以说孝明天皇不仅在幕府末期的政治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而且对近代天皇制的成立也具有重要意义。因而 在思考这一问题时 我们应该正确地看待孝明天皇的行动 客观地评价他的历史作用。

本文尝试探讨以上的问题（所引史料如无特别标注 都出自《孝明天皇纪》）

神奈川条约与孝明天皇

孝明天皇有关国政的发言最早出现在佩里 来航的前八年，

Matthew Calbraith Perry(1794—1858年)美国海军准将 东印度舰队司令。1853年率舰至日本，1854年复至 停泊神奈川 强迫日本签订《日美和好条约》。中国史书多以“培理”之译名出现 但也见“柏利”“培利”“彼理”等多种译名 似未约定俗成 故本书取“佩里”亦即中国大百科全书和不列颠百科全书采用之规范音译。——译者

即 1846 年 弘化三年 的《意旨书》当中。他说：“风闻近年时时可见异国船只 然值本国文道能修 武事全整之时节 海防尤坚固 本无所虑。但近顷屡闻其事甚为挂念。望各将士对洋寇不侮小寇，不畏大贼 施以良策。为保神州之无瑕 宣严格操练 才可安皇室之心。故特发此令。”那时孝明天皇十六岁 即位仅半年。因此大家认为这种行为是由当时的关白鹰司政通主导的。那时的政治与一般百姓几乎毫无关系，但日本周围的形势变化已经波及到了宫廷内部。江户时代中期以后 产生了所谓“北边问题”的对外问题。1840 年（天保十一年）的鸦片战争使得欧美各国急速推行将亚洲殖民地化的政策。其结果，一直以垄断对日贸易为基本方针的荷兰 为了掌握日本开国的主导权 于 1844 年 弘化元年 向幕府递交了敦促开国的国书。1845 年（弘化二年）英国船只到达浦贺，1846 年 弘化三年 美国海军司令毕德尔航行到浦贺 同年荷兰第二次递交国书 每年都有这类催促日本打开国门的行动。特别是以后期水户学风靡日本思想界的水户齐昭号召世人警惕对外问题 他在推进藩内改革的同时 于幕府末期时常四处活动。水户齐昭通过与五摄家之一的鹰司家的联姻关系 也常向京都方面做工作。与水户藩渊源很深的鹰司家担任关白期间 弘化三年《意旨书》的提出，不能不说与水户齐昭的活动有很大关系。与此同时 如果说是水户学的影响表现为这种形式 那么 也可以说是水户学的观念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由天皇对对外问题 当然与对内问题有关 发言一事可知 幕府的权威已发生了变化 此外 后期水户学的尊王论已成为一股巨大的浪潮，天皇也成为其拥护者（对天皇而言是自身的觉醒）。前期的水户学主要致力于日本国内封建统治体制的理论建构 与此不同 后期水户学以会泽安的《新论》为代表 认为西洋诸国是“夷狄” 强调他们侵略的危险性 并通过这种对外危机感 建立了民族、国家的自觉性。而且，《新论》强调了日本依照天照大神的神敕 其子孙天皇始终居于天子之位 具有优越于其他各国的独特性。当时的《新论》认为西洋诸国“乘民心之涣散 阴诱边民 暗移其心”，

极其重视对外 危机中国家的统治中心——天皇的存在。如下文所述 孝明天皇的思想可以说也是遵循着后期水户学的轨迹。

1853 年 嘉永六年 佩里来航 第二年 安政元年 日美神奈川和好条约缔结，对此，孝明天皇并没有作出特别的举动。这是因为，当时日本方面理解神奈川和好条约只是允许外国船进入下田、箱馆两个港口，而且只是提供粮食和饮水。这在打开锁国政策的突破口上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但是外交关系、通商关系的问题还悬而未决。所以安政元年闰 7 月 朝廷向幕府发出的《达书》中说：“先前渡来之美国船只退帆之时 自行停泊于以上两处。此行径已犯本国制度。然其时船军整备未及，可平稳处置之。水陆军事未整之际 唯有此法 ” 暂且承认了幕府的处理方式。但同时 文书中又提出：“但若以此姿态经年累月 异类更侮 熟知贼谋实属不易。加之诸夷纷纷来日 致使国家疲弊 国体如何 睿虑不安” 说明了“睿虑”不能再作出更大的让步。也就是说 文书中对于神奈川条约的承认 只是一种“特例”的处理 而且希望对象只限于对美国一国。此外 文书中还说：“于武门亦应警戒无懈 遵弘化三年八月所颁之令 各国 各藩 尽全力 当为神州之无瑕而勤练军事。再感睿虑 特发此令 ” 从其因袭先前弘化三年的文书来看 可以说当时孝明天皇的意志是主张将对外问题纳入神奈川条约的范围之内。在之后的许多文书中，孝明天皇都主张以神奈川条约作为处理对外问题的限度 所以我们可以认为这份《达书》相当正确地反映了孝明天皇的意志。

安政条约与孝明天皇

拒绝敕许条约

如前所述 孝明天皇主张将对外关系纳入神奈川条约的范围

之内 但形势的发展并不允许他这样做。

继美国之后 日本与英、俄、荷等国缔结了和好条约 与更多国家建立了联系。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背景下，美国总领事哈利斯于 1857 年（安政四年）逼迫日本正式建立通商和外交关系 问题变得更加严重了。

幕府早在佩里第一次来航时就放弃了一向外交、内政的专断独行，开始征集诸位大名以及布衣以上阶层的意见。但是在是否接受安政条约的问题上 幕府内部出现了完全对立的意见 所以在再次征集意见的同时 让首席老中崛田正睦前往京都 求得天皇对条约的敕许 意图通过天皇的敕许让条约的缔结具有权威性。

这种行为本身打破了一直以来一切内政和外交都由幕府掌控的原则。虽然征集各大名的意见是个特例 幕府自己还是以“参考意见”的形式保留决定权 但这种做法还是增大了各大名 特别是雄藩的发言权。“敕许”的申请 理念上是为得到把内政、外交的一切大权委任给幕府的天皇的承认 但在尊王论抬头的情况下 这是一件大事。此外 这个“敕许”出乎意料地直接受到了孝明天皇的强烈反对。孝明天皇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明显地表现出他的政治行动。

1858 年（安政五年）1 月 17 日 孝明天皇给九条尚忠关白的文书（宸翰）中写道 这次的事件“实为异事 乃天下之大事。诚忧虑之至”。他意识到问题重大的同时指出“敕问虽形式相同 然实已无济于事” 强调这一问题的处理不能像此前那样 由幕府提出公式化的报告 然后由天皇象征性地垂询公卿和老中这样的“形式”来解决。“此实乃天下之大事 故众卿畅所欲言即可” 他希望公卿们对这个问题能踊跃提出自己的见解。文书中进一步指出“备中守 崛田正睦 此次上京献物之事 事后已从公卿处听闻。所献之物如前所述 纵其如何贵重 唯使人目眩且为天下灾害之本。人之贪欲不外乎为黄白所迷。心迷之事其限有之，然此心迷将致骚动” 认为金银从来都是幕府与京都朝廷打交道时的必备品 但也

应该防范用金银贿赂收买公卿。“如上所述，朕不受任何金银之物。”天皇拒绝接受幕府的进贡，是想从自身做出榜样。

接着，孝明天皇在上述文书中阐述了反对缔结条约的理由：“日本国中不服将造成大骚动，若依夷人之愿则为天下一大事。代朕行此仪式则其后耻辱无尽。且于伊弉神宫始处，羞愧万分。面对诸位先祖，朕身不孝，无地自容，实为担心。”就像文中所说，他反对的理由在于国内秩序的稳定以及日本的独立将会受到外国的威胁。

同月 25 日，天皇向大纳言、中纳言、参议征求了外交意见。在 26 日送交关白的文书中，他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此次各所存书令已阅，多为同意之意见，然朕仍存顾虑，望诸君听取。”这里孝明天皇认为“……开港开市之事，任阁老上京如何游说，固否决之，况距畿内不远，禁设之。”他坚决反对开国、贸易，特别是强烈反对在京都附近设置港口。“又及夷人要求开港之事，若应允之，则成为天下之大事，于愚身难以应允，凡事皆不许。夫异人之辈不听者，其时攻之可矣，此为朕之决心。”他指出，就算因拒绝条约而开战也在所不辞，表明了强烈的反对立场。

孝明天皇在文书中提出“就此事，凡三家以下诸国大小名，敕问皆应畅所欲言。同意签约者定有之，然应允夷人要求之事，实为天下之忧。”天皇认为应该向幕府亲藩的三家以下以及幕府统治下的全部大名征集意见（实际上是希望得到反对签约的意见），堀田备州（正睦）又上书，朕未应允，不快。后以出家相威胁。此天下之大事，任备州一人如何要求，朕决无疑惑，当以更强意志返答可矣。万众一心于太閤（鹰司政通）一处，定能成稳定之大局。然当职之事，若无远虑，不努力，事态发展可忧。这里更表明了不同意敕许，任凭幕府施加多大的压力也不承认的意志。从以上几点来看，这一阶段的孝明天皇在努力集结公卿力量的同时，也在动员各大名摆出了不畏幕府最高负责人施压的态度。后面提到孝明天皇根本不曾想要否定幕府的存在，而且这个念头始终没有改变，但史料中所表明，孝明天皇对公卿自不用说，他还想要位于统率幕府和各大名即

当时所有统治势力的顶峰。当时下级武士的势力还未在中央政治舞台上抬头，人民的力量也未登上政治舞台，因此可以说他面对的实力就是当时所有的政治势力。这里可以看出一个仅仅是形式上、精神上的主权者开始向实际意义上的主权者蜕变的王者之姿。

想要使天皇从形式上、精神上的主权者向实际上的元首转变的倾向，在其他方面也有所表现。2月16日，孝明天皇在给左大臣近卫忠熙的文书中写道：“据云诸大名以下人等，经深思熟虑，皆愿以朕为首，是瞻然如汝所知，朕一愚昧短才之质，毫无气量。”显示出诸侯们也希望天皇是国内统一的中心。这个阶段的统一是以幕府的存在为前提的，但必须注意到诸侯也一直在期盼天皇能成为“元首”。这是因为①江户时代中期以后，随着国内统一市场的发展，形势要求实现一个以统一市场为基础，以天皇为中心的统一国家的形势。而且，一直以来赋予幕府权威的尊王论的内容也发生了变化。②对外问题的产生及深化，提高了人们对作为国内统一中心的天皇的期待。由于幕府权威的丧失、将军家庆的过世、将军家定的愚笨、病弱，包括大名在内的各阶层寻求强权中心的风潮高涨。同时如前所述，孝明天皇也觉察到自己所处的状况，一直在努力满足大家的期望。在文中他说道：“并非朕欲成为宜者，实皆为日本国之故，决非为朕一人。望众人贤察。此次之答复，照目前之状况，恐难慰众人所愿，心痛不已。”这里可以看出孝明天皇将自己的意志代表整个国家的利益。至此，孝明天皇在客观上和主观上都逐渐成为日本的代表。

安政条约的敕许问题发生之初，太阁鹰司政通的意见是遵循以往的惯例，向幕府提出一些问题，其后天皇应该给予许可。因此，孝明天皇在此前1月26日的文书上说：“太阁之处虽有温和指示，万一当事之人无远虑，不努力，事态发展可忧。”2月26日给左大臣近卫忠熙的文书里也指出：“唯愿尊公为朕之同盟，厚恩恐难表尽。虽意见不同者有之，望众人不懈努力。”22日送交关白九条尚忠的文书提到：“太阁处之意见，与愚身思虑不符之事，明日书信

向尊公详告之”，“今昼太阁所存书信无用上奏”，今日太阁所禀之事无一随愚身所愿，难答矣”。以此寻求同盟（在安政大狱时期，九条尚忠为了与幕府合作而反对天皇，近卫忠熙和鹰司政通等人反对九条尚忠与孝明天皇同一立场。）

进入 3 月幕府越发催促条约的敕许。3 月 5 日孝明天皇给近卫忠熙的文书上说：“且全体希望于关白之处采取对策，皆谓许可条约之事实为近患之基，不宜答允。朕答曰不许之时，夷人可致战争。若许美夷之条约，战事不致。然他国其时必致战争。”当时孝明天皇似乎也考虑到拒绝条约可能引起战争。同时他对幕府的态度强烈不满。3 月 6 日他给近卫忠熙的文书中表现出他对朝廷上妥协论的抬头感到失望，“苦于无方而放弃，实难应允”表示出他无论如何也不会模棱两可地承认条约。从这些文书中可知，由于幕府对许多公卿软硬兼施，使得朝议上出现许多不得不承认的意见，即使如此，孝明天皇也始终采取不承认的态度：“朕以为大树（将军家定，愚昧，此话不可外传，关东屡次请命为征夷将军。就此事，朕不得不言。）由此可知，将军家定的愚昧使得幕府不可依靠。将孝明天皇逐渐推上“元首”宝座的一个原因是，本应是日本政治、军事最高负责人的将军愚昧、病弱。孝明天皇由此成了引导朝议反对条约的中心人物。

不管幕府方面如何拼命努力，也无法改变天皇的态度。3 月 1 日孝明天皇给近卫左大臣的文书中说：“若拒绝之意强硬，则有损崛田之健康，如此，朕实为不体恤之至，且有害与大树将军之关系，实为难之至。”不敕许条约的签订，会令首席老中崛田正睦陷入窘境，且与幕府关系也会恶化，天皇对此为难不已，但仍坚持拒签条约。于是 3 月 20 日，他召见崛田正睦，通过武家传奏，重申了反对条约的敕书，同时，传旨幕府将三家以下各大名的意见收集上奏。

这个处置给幕府及其负责人崛田正睦巨大的打击。崛田在条约签订之前，请求前所未有的“敕许”，就是要在尊王论盛行的时

候以“敕许”为名压制反对者的声音。而且他也认为这次的“敕许”将同以往一样容易得手。崛田正睦3月24日上奏朝廷说与美国的交涉到现在才说拒绝签约非常困难所以在遇到意外变故时希望朝廷同意其采取随机应变的措施。但是同日天皇通过武家传奏表示即使被迫宣战也要无损国威防御的对策交由各藩众议。这样，天皇在政治的大方针上，对幕府也发表了强硬的意见。

幕府强行签约

朝廷不承认条约，此事对幕府来说是一大打击。同时这对朝廷及其中心人物的孝明天皇而言也是前所未有的事件，他们也预料到了幕府方面的反击。5月1日孝明天皇交给九条关白的文书上说：“昨日商谈武传、武家传奏之事，欲以书信告知太阁。然思虑良久，朕以为如此危机四伏之时，疑虑尚存，故至今日尚未告知。”天皇计划更换朝廷与幕府之间的联络人武家传奏，与此同时任命权大纳言万里小路正房为武家传奏，权大纳言中山忠能为议奏。这两个职位虽说是归属朝廷，但一直以来都是由受幕府欢迎的公卿担任其职，所以这种人事变动实际上需要幕府的支持。孝明天皇不遵从以往的惯例而单方面更换这两个职位，甚至任命自己的亲信，这也可以看出他在否决条约后对幕府的态度。

安政条约得不到敕许，对幕府是一大打击，在幕府内部引发了追究首席老中崛田正睦责任的问题。4月3日彦根藩主井伊直弼被任命为大老，5月2日这一消息传至朝廷。这同时意味着在就将军继嗣问题展开的激烈的政治斗争中，纪州派取得了胜利。

井伊大老对日本的开国并不持积极看法，但是在当时的外部压力下，他认识到拒绝外交、贸易已经是不可能的事。况且他作为谱代大名门阀阶层的代表，首先考虑的是恢复“幕府权威”。朝廷和诸大名对幕府的政策提出看法及反对意见，井伊都非常反感。特别是井伊大老认为，朝廷强烈反对签约事件的背后，是水户藩在

活动 实际上这个活动的中心是刚才提到的孝明天皇)

井伊直弼在江户就任大老之时，孝明天皇交给九条关白的文书上说：

“至于美夷一事 关东迟迟未表态。若最终拒绝 其同盟之诸蛮，一同来袭难料 应严格防御之事。此实为天下国家安危存亡之时 深感悲痛。朕将向神明佛陀祈祷其加护 且当时 关东武备不整 望严加武备 万一诸蛮挑发战事 不致手足无措。时乃多事之秋 虽战事未起 应以战争姿态备之 宫中不论大小公事私仪 自今年起 一切从简节约 专备武用 可助之。

“神事佛事如前述 朕将为天下苍生祷告不止。

“备中守归府 定已与关东众议 朕心甚不安。事态发展难料。众人之理由 前文之事 二者商量之结果 皆可上奏。”

孝明天皇一方面担心幕府今后将断绝与朝廷的联络，另一方面也担心如果拒签条约，以美国为首的欧美诸国将联合起来攻打日本 所以 他希望节约宫中的各项费用而致力于国防。但是孝明天皇完全不了解日本周围的形势以及欧美诸国的情况，对欧美诸国也毫无具体的对策 除了节约宫廷费用之外 也只是强调向神佛祈祷。

这时 幕府内部不断发生巨大的变化。

一得知井伊大老就任的消息 孝明天皇在 5 月 12 日给近卫左大臣的文书中说道：“关于彦根大老就职 其实难解 各方担心之至”表明了他的疑虑，“将出现如何强硬之回答 难以估计”他也预料到压力的增大。他还说“此次关东之回答 无论结果如何 朕将始终抱从前之意”，就算压力再大也拒绝赦许。13 日给九条关白的文书里说“井伊就任大老 诸事皆与朝廷对立 由此可知关东之意”他清楚地预料到井伊就任大老之后 幕府将施加更大的压力。“朕难容忍。不论哪个国家 如何要求 朕必无二念坚持以上态度。在此重申”表明了不论承受多大的压力 自始至终拒签的决心。5 月 2 日给近卫左大臣的文书中提到他因外国船只进入大

阪的传闻而惶惶不安 同时给九条关白的文书中说‘若关东决定签约，一旦事成 恐回天无力。此大事哉！’他担心幕府无视天皇的反对而签约。

天皇的担心应验了。崛田老中申请赦许失败后，井伊大老也不再打算活动。井伊始终认为幕府对日本的外交、内政拥有一切决策权 恢复即将崩溃的幕府权威是最重要的 而且他相信是水户藩的活动导致朝廷反对签约的。所以他签订了安政条约，并在 6 月 28 日以“事情迫切”为由 才将此事上报朝廷。

幕府的这种做法激怒了孝明天皇。

他在 6 月 27 日给九条关白的文书中说：“今日武倭 武家传奏 宣布美夷之事。实属意外之事 此生死存亡之时 万分悲痛”，表明了强烈的不满。孝明天皇更在当天给九条关白的文书中说：“日本由古而今子孙相继 尊正流辅之他流。自神武帝始 皇统连绵 他国无例 唯日本独有之。此皆天照大神之仁慈 尊崇之情言语难表”。由此可知这是他攘夷观的基础。

孝明天皇还说：“异国船只每每渡来 且美夷使节乞交涉、亲善、通商。表面陈亲睦之情 实为后年并吞之志。以阁老之名上奏条约 实非易事。先前之事朕已承认 其后之事经深思熟虑 万难答应。实为神州之耻辱 且邪教污染难以预测 故难允。”他认为条约的缔结最后将使日本丧失主权；基督教的传播也将使日本失去精神独立。虽然孝明天皇反对的理由出自神国观和保持独立的立场 但在欧美诸国欲使日本殖民地化的危机已成为现实的当时 后者在某种程度上也代表了国民的立场。“若许之 则战争不至。然治世数年 人气怠慢 武备不整 难御敌 实乃紧急关头 痛心不已”他极其深刻地感受到了这种危机。

文书中更提到“纵以武士之名目治世 亦难御敌 征夷之官职 其实难符。当时关东强求委予政务 然政务需公武协力 非易事”。他认为幕府的做法完全不符合“征夷大将军”的称号 对幕府以“朝廷已将政务委托于关东（幕府）”为挡箭牌而签约的行为表示了强

烈的愤慨。

孝明天皇更是在文书中说道：“如斯之时节 决无安逸之望 实如前文所言 朕以愚昧之质 居帝位听万机政务 治国之事力不能及 ”表明了让位以示抗议的决心。

“ 颁布敕令 ”

另一方面 没有敕许就签订条约 在幕府方面也成为一大的政治问题。当时 由于外部压力和营建与其相适应的国内体制 幕府也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心人物。几个藩当中，在下级武士的主导下，一直以来的门阀统治被改为直接以藩主为中心的所谓“名君”体制。在幕府内部 也出现了由熟悉实际事务的中、下级幕臣组成的“能吏”阶层。佩里来航后的形势使得幕府也希望在强大的将军之下 成立一个包括“名君”、“能吏”在内的新体制 用以取代门阀统治。由于将军家定的愚昧、病弱，在围绕将军继嗣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这次斗争分为两派。一派是由“名君”“能吏”阶层组成的一桥派 拥戴一桥庆喜 另一派是由企图恢复幕府权威地位的谱代门阀阶层组成的纪州派，拥戴纪州藩主庆福。井伊就任大老意味着纪州派的胜利。井伊大老强行签订安政条约 并不是因为确定的开国信念和方针 而是基于幕府的决定不允许大名、朝廷干涉的原则。

由于无敕许就强行签订条约 6月24日一桥派的水户藩主德川庆笃、尾张藩主德川庆恕、水户前藩主德川齐昭以及越前藩主松平庆永等人“突然进入江户城”责难井伊大老。同日，一桥庆喜也指责了井伊。这些导致了7月5日井伊提出对他们施以处分。

当时一桥派的中心是松平庆永等人 他们虽然也主张开国 但认为一直以来的幕府独裁不合现状 主张实现包括朝廷、幕府、诸藩在内的全国统一体制，因而强烈反对没有得到敕许就签约。

因幕府签约而被激怒的孝明天皇，要求幕府派三家以及大老

上京说明情由。他在 7 月 22 日给近卫左大臣的文书中再次表明了让位的决心。天皇在 7 月 27 日的‘敕书’中对尾、水两位藩主的处分和崛田正睦、松平忠固两位老中的卸任表示疑义。他说：“大老上京 迁座之事难测”对幕府可能乘井伊上京之机 把天皇监禁于彦根的传闻表示担心。又说“近期间部下总守使晋见 虽不知所奏何事 定为申辩签约之事而来 其时如何应对需早作思量方可”，这说明他对间部老中上京之事正在思考对策。

与美国签定通商条约之后，7 月中幕府又与英、俄、荷签订了同样的条约。孝明天皇这时几度表示要让位，都被左大臣近卫忠熙、鹰司辅熙阻止。但他在 8 月 8 日下达‘御趣意书’（敕书），谴责幕府的行为。这份‘敕书’阐述了不给予敕许的理由是：“……条约（友好通商条约）之事若成 实为神国之耻 难以面对神宫始皇祖。朕知若允关东所禀亲善条约之事 害迟 若拒则害速。然皆为天下之大患 签约则失皇国之大体 且后患无穷 于公武皆为祸事”，重言之 违反朕意 实为不信之至”严厉谴责了幕府不打招呼就自行签约的行为 而且强烈质问幕府对水户、尾张藩主的处分 甚至威胁说“非常之期 国家大事任由关东横行操纵 凡事皆听其可乎”，号召大家反对幕府的‘横行’。在‘敕书’后的‘添书’中写着：“诚皇国重大之事 签约之后上禀 与大树公 将军 所虑不相符 尤与敕答相背，乃轻率决定。大树贤明之处，有司如何体会，深感怀疑。如前所述 蛮夷之事暂缓 当今国内之治乱 更使朕忧虑。”孝明天皇极力回避将军的责任 忧虑此事会引起国内的对立。对尾张、水户两藩主所受的处分 他说“三家及大老上京之时 闻说水户、尾张两家被处分 且其余宗室 松平庆永等 皆为同一命令所罚 以上诸人何罪有哉。难以知之。然皆为柳菟 幕府 之羽翼 于当今外夷纷纷入津不易之时节 无视人心之归向 可恼”表示了强烈反对，号召大家“此国家大事 大老、阁老其他三家、三卿、家门、列藩、外样、谱代一同群议 评定之。以忠诚之心得相正。国内治平、公武长久合体 于德川家族扶助有之 整内而不受外侮。应早做商议、

特颁此令”。孝明天皇的意图最主要是公武合体，但是却号召各大名反对幕府。在发给水户藩的“别纸”上写着“同列诸位，自三卿、家门之众以上，至各隐居之人，对列藩均应传达，以体察朕意。”他号召将敕令传达给包括那些被幕府处以隐居处分在内的大名。

这份“敕书”于8月8日传至水户藩，9日传至幕府，同时通过有关公卿传达到尾张、越前、加贺、萨摩、肥后、筑前、安艺、长门、因幡、备前、津、阿波、土佐十三个雄藩。

发出这样内容的“敕书”，并且号召以水户藩为首的各大名采取行动，这不仅是前所未有的事，其巨大的政治影响也是无法估计的。旧幕臣福地源一郎在《幕末政治家》一书中写道：“对德川幕府而言，此敕书实为一大打击。并伊内阁依靠德川幕府之基础，以幕府之专断使条约签字。然朝廷责其必须竭尽诸大名之群议，而后奏闻敕许。并伊以幕府之台意谴罚尾水越。然朝廷宣称：此系何等罪状？彼等议论乃人心之归向。并伊固信内治外交均幕府主权内之事。然朝廷宣示意欲以公武合体扶助德川家。若如此敕命有实效，外国之事将暂搁置，有关国内政治，幕府主权亦将立即移至朝廷，致使幕府不过成为朝命之下达者而已。”

幕藩体制解体的前提是封建经济的崩溃，使体制解体的原动力不仅有外部压力，人民斗争的激化也是一个因素。笔者认为幕府末期、自由民权时期变革的底流是在于土地革命的动向。^①但是，如果只看政治因素，可以说“敕书”的破坏力是巨大的。当时政治舞台的势力，除幕府之外，还有开始发言的天皇、公卿及各大名，下级武士、草莽阶层也逐渐登上政治舞台。而且，当时将军和幕府的权威已经下降，人们期待天皇能成为统合国家和国民的核心。在这样的时期，否定幕府的行为，以及号召各大名反对幕府的举动，给幕府带来了决定性的破坏力。就像前面福地源一郎所说的：“并伊相信，幕府存亡系此一举，如尽其力，尽其策，施以威力，施以暴

① 详细资料请参考拙著《日本近代国家的成立与革命形势》(八木书店)

断，而仍不能使此敕命无效，则幕府必当灭亡。于是与间部等谋，为多方对抗策而费尽心机。‘安政大狱就是对‘敕书’的拼死反扑。这次反扑以井伊大老的死亡、幕府的败北而告终。之后幕府只剩下一个躯壳 加快了灭亡的进程。

即使没有以上的行动，幕府的垮台也是不可避免的。但仅从政治方面看 这个时候要是没有这样决定性的破坏力 幕府消亡将会减慢，社会的进化也会随之推迟，对外从属的危机将进一步加深。

孝明天皇虽然最终都没有否定幕府的存在，但无论他的主观意图是什么 毫无疑问他所发表的‘敕书’在政治上给幕府带来了致命伤。可以说这个时候，天皇确实已经成为国民舆论的代表。

安政大狱和孝明天皇

“颁布敕令”对幕府是致命的打击。如前记中福地源一郎所说，安政大狱是幕府受到致命伤后的拼命反击。井伊大老和其心腹长野义言认为“颁布敕令”的最大原因是水户藩和一桥派的策动。于是，他们向水户藩施压，让其交出天皇下给水户藩的“敕书”。水户藩虽然有“敕书”但是缺乏行动的实力。由于水户藩拼死拒绝向幕府交出“敕书”幕府对其施加的压力也随之加大。

此外 井伊通过迫使藩主、公卿隐居 落发为僧等手段 处分了大批一桥派的藩主和公卿，还把藩主的谋臣以及那些可能与大名联系的中间人——公卿的家臣、游说公卿的志士大批处以刑罚 投入监狱 进行严厉镇压。之后 井伊又处分了天皇身边的太阁鹰司政通、左大臣近卫忠熙、内大臣三条实万。天皇强烈抗议这些行为。

井伊大老还把老中间部詮胜派往京都，向天皇说明海外形势，想再次取得天皇对签约一事的敕许。1858年（安政五年）10月25日 在孝明天皇写给近卫左大臣的文书中说道：“间部称 原亲善条

约一事并非由下总守间部始大老井伊也是如此。然原备中（崛田正睦伊贺松平忠固）行为不端，今更猖狂，甚为忧虑。幕府背负水府之阴谋，认为应以镇压内乱为重，不然外国之事将更难处置。其欲将过失推诿于水府。且夷人杂居之事，下总守定不容许”。由此可知，幕府始终认为“敕令颁布”是由于水户藩的阴谋，条约的签订并不是因为幕府有坚定不移的开国方针和信念，仅仅是迫于美国的压力和没有任何预测的情况下签订的，企图将此责任推卸到前任者身上。

这种态度当然无法说服孝明天皇。天皇下令“回到下田条约”，要求以日美和好条约为底线。并指出此事不是水户藩的阴谋。

11月9日写给九条关白的文书中，孝明天皇阐述了他的对外观：“蛮夷之事，思虑良久，吾以为无论事态如何，此为令日本国蒙羞之事实，难应允。日本国寸土皆不容夷人侵犯。即使东使间部詮胜多次游说，但决不允允。”此处，天皇再次表明了他决不承认的意志。“条约虽有年限之说，但一旦应允，国耻难雪。统仁天皇的名字，坚决不允。如若条约通行一日，即为承认之意，吾将愧对神宫始皇祖。”因此，即便有年限的规定，天皇也绝不允许。“天下黎民必丧失希望，且必威胁幕府之存在，如此今后困难重重，条约即便实施一日半日，也难应允。”认为该条约的缔结还会威胁到幕府的权威，因此遭到天皇强烈反对。此外还写道：“正如春时所说，如不回到下田条约，便难应允。”天皇主张撤回条约，“朕以为若将港口设为神奈川，外夷纷纷涌入江户，此万万不可。他人之事可以与己无关，可以不问，但此乃国中之事，且离江户城不远，倘若有变，何其危险。此乃朕难应允之理由。如若不应允神奈川，事态弥艰，如若应允，朕以为应与长崎一样，严加控制，否则易出大乱。”天皇反对将开港的港口改为神奈川。就算要变更，也要像锁国时期的长崎那样施以严格的管制。在12月24日写给九条关白的文书中，天皇再次反对大阪、兵库通商之事，“近闻新潟港将成为开放港